

双向返乡，回「家」过年

□ 李亚儿 文 摄

真没想到，我也成了抢票一族了。

从媳妇怀孕那年起，我和先生便不再等孩子回家，而是“反向”——奔赴儿子的城市，在他家里过大年。

先生这辈子没说过几句甜话，却把“家”字刻进了骨头里。他总觉得，过年就该是孩子回到老家，围在那张圆桌旁，热气腾腾才是正道。可现实是，儿子早已在异乡扎了根，有了自己的家，自己的圆桌。先生心里那道弯，转了足足好几年。

转机，是孙女出生的那一年。那时小家伙才3个月大，哪经得起路途的颠簸。先生挂了电话，只一句：“今年，我们过去。”

从那以后，我们的“年”，便开始了一场“反向”的返乡。

腊月一到，先生那套专属的过年“仪式”便准时启动。他先去相熟的海产铺子，挑最大最肥的鳗鱼，嘴里总念叨着：“没有新风鳗鲞，不算过年。”鳗鱼买回来，洗净、剖开、细细抹盐，再挂到北阳台最通风的角落，北风穿过鱼身，带走水分，凝住最醇厚的鲜。

接着是酱腊肉，上好的五花肉，他用秘制的酱料反复涂抹，每一道缝隙都不放过；而后是灌香肠，肥瘦比例要精准，肠衣要透而不破；最后是红膏蟹，他总要亲自去码头等归航的渔船，专挑那些膏满得快要顶出蟹壳的。

出发那天，我们两人各拖一个行李箱，背上是鼓鼓囊囊的登山包，手里还拎着塞得变了形的环保袋。邻居见了打趣：“你们这是搬家啊？”先生笑呵呵地应着：“给孩子们带点吃的。”

儿子多次劝阻：“现在什么买不到？何苦每次都带这么多。”先生摇摇头：“不一样。味道不一样，这是家里的味道。”

窗外的风景飞速后退，我看见车厢里挤着许多朝着故乡方向奔波的年轻人。我们和他们，

行向相反的方向，却怀着一模一样的心情——把心里最重要的东西，带到最爱的人身边。

到了儿子家，先生便一头扎进厨房，很快，熟悉的锅铲相击声便在屋里响起，那是独属于家的交响。

新风鳗鲞在蒸汽里渐渐变得油亮晶莹，酱腊肉在热油中爆出复合的咸香，香肠与米饭同焖，油脂慢慢渗入米粒，泛出琥珀般温润的光泽；红膏蟹揭开盖，满壳的膏黄如凝固的夕阳，丰腴动人。

孙女颤颤地跑过来，小手扒着桌沿，眼睛亮晶晶的：“爷爷，好香啊！”先生笑着把她抱上膝盖，夹起一块鳗鱼递到她嘴边：“尝尝，这是爷爷做的。”

我想起他常说的一句话：“年夜饭在哪吃，家就在哪。”以前我不全懂，此刻忽然明了。他不是固执，只是想把“家”的味道，亲手搬到孩子所在的地方。他坚持的从来不是地理意义上的“家”，而是一种刻在骨血里的传承。他让孙女知道，世间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味道，叫“爷爷的味道”。

这或许就是中国人过年的全部秘密：从来不是非要回到某个固定的地方，而是让心抵达该去的地方。像我们这场反向“返乡”，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，把“家”这个字，写得更加辽阔、更加温暖。

抢票时的那点焦躁，打包时的那份沉重，旅途中的所有辗转，都在孩子打开家门、笑着喊出“爸妈”的那一刻，尽数化作值得。因为真正的年味，从来不在某一张特定的餐桌上，而在那份“无论如何，也要在一起”的心意里。

我知道，以后的这个时候，我依然会是抢票一族，依然会大包小包奔赴远方。

对先生来说，那些沉甸甸的行囊从来不是普通的行李，那是可以移动的、装着所有牵挂的家。



作者先生去儿子家过年时必带的几个宁波菜。

## 怀念故乡的年味

□ 林海燕



带给作者浓浓年味回忆的那个小山村。

腊月一过，一种熟悉的喜庆气便如晨雾般氤氲开来。天色总是灰蒙蒙的，空气冷冽而干净，炊烟从各家屋顶袅袅升起，混合着柴火与腊货的香气。年味，就这样悄悄地来了，弥漫在村庄的每一个角落。

我的家乡在一个小山村，村边有一条清澈的小溪，终日潺潺，蜿蜒流向远方的大海。溪水不深，底下铺着圆润的鹅卵石。我的童年就在这溪水声中悠悠度过。那时的年味很浓，浓得化不开。融入了祖祖辈辈“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”的朴素愿望里，写在每一张被西北风吹红的笑脸上。

在物质紧缺的年代，年味就是一碗红烧肉。村里杀猪的日子，便是孩子的节日。天没亮，猪叫声便划破村子的宁静，我们裹着厚厚的棉袄，缩着脖子围在屠宰场边，既害怕又兴奋。那个时候，母亲总会细心地将肥肉熬成猪油，盛进白瓷罐，凝成乳白的一团。记得有时放学回家，把热腾腾的米饭用酱油拌匀，再点上一小勺琥珀般的猪油，看着它渗进饭粒，便觉得那是人间至味。

村里几个小伙伴整天穿街走巷，最喜欢跑到村口的沙场跳绳、追逐嬉戏，直到夕阳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。那时，谁家锅里有肉香飘出，窗玻璃蒙上一层温润的白雾，就在整个腊月里都透着一种幸福。

我家算过得不错的。爷爷曾是温文的先生，嘉兴教书回村后，被安排管理村里小店。我常溜过去，趴在柜台上看。爷爷见我来了，总会笑眯眯地招手，然后偷偷往我棉袄口袋里塞几颗糖、一把花生米和几块饼干。他最疼我，过年时，我的衣兜总是被零食塞得鼓鼓的，走起路来哗啦作响，那是我整个童年最富足的声响。

母亲常年在外奔波做生意，过年时却从不含糊。除夕那天，她从清晨开始忙活，灶火熊熊，蒸汽弥漫。满桌的菜肴，鱼虾鲜香，父亲在水产公司工作，总会带回各种海鲜。鱼是整条红烧的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那时我总觉得自己是全村最幸福的孩子，年夜饭的香味，能把整个冬天都烘得暖洋洋的。

鞭炮是过年的亮色，也是空气里

最跃动的音符。我们都不敢放大的“雷公炮”，每人只能分得一小撮小鞭炮，非得留到除夕夜才舍得放。最早玩的是一种握在手里、会“嗤”一声喷出耀眼金花却不响的“电光棒”，我胆子大，常拿它和别人换更刺激的响炮。男孩们总爱使坏，把点燃的鞭炮偷偷丢到正在跳皮筋的女孩脚边，“砰”的一声，吓得我们尖叫着跳开，随即又忍不住一起哈哈大笑。整个村子都浸在连绵不绝的清脆噼啪声、淡淡的火药香和此起彼伏的欢叫声里。

我们也爱玩过家家的游戏，学着大人“娶新娘”。那个时候，用红纱巾盖在谁的头上，谁端着破碗当“酒”，都能争上半天。我家屋外有一片很大的园子，种满树、花和菜，那院子便是我们的乐园。东边是猪圈，西边堆杂物。我们在那里捉迷藏、跳房子，不知疲倦地追追赶赶，冻得通红的小手，呵出的白气，几乎要掀翻那方小小的院落。

小时候，过年是一种漫长的、甜蜜的盼望。从腊八就开始数日子，盼好吃的，盼新衣裳，盼热闹，盼团聚。那时没有电视，一家老小围着炭盆，火光映着一张张脸，嗑瓜子、讲故事，快乐却满得要从心里溢出来。跟着大人走家串户拜年，穿上最好看的衣服，口袋被糖果塞得满满的。去大姑姑家，她总会神秘地把我拉进里屋，从高高的橱柜顶上摸下藏好的过年食物；去舅舅家，舅妈会塞给我热乎乎的煮鸡蛋和糖果。如今，大姑姑和舅妈都已不在了，每逢年节，那些温存的笑容、那些入微的疼爱，思念便悄然浮起。

后来，我在城市生活了许多年。记忆里的年味，不知不觉淡了。城市与乡村，似乎都只剩门窗上一个静静的、红得有些寂寞的“福”字。年味好像越来越远，儿时的记忆却越来越深。原来，那绵长隽永的年味，不过是淳厚温暖的人情味，是亲人围坐时呼出的那团白气，是口袋里糖果窸窣的轻响，是鞭炮炸开后弥漫在冷空气里的那股微涩的香气……

年味，它在岁月里沉淀成一道微光，永远亮在心底的某个角落，温柔地提醒着：你从何处来。